

#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郑兆峰 宋洪远

**【摘要】**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通过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和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显著提升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既缩小了农村内部整体的收入差距,又缩小了村庄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益贫性,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水平农户、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户增收,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据此,文章建议扩大试点政策覆盖区域,推广返乡创业试点经验;继续大力支持返乡创业,激发农村地区创业活力,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共同富裕效应。

**【关键词】**返乡创业 农户增收 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

**【作者】**郑兆峰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宋洪远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 一、引言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支撑农民增收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张敏等,202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习近平,2023)。由于创业具有倍增的就业效应,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政府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的重要部署。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农村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建设。然而,在返乡创业热潮逐步兴起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那么,值得思考的是,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究竟是否促进了农户增收?回答这一问题,能够为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理论依据,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关于创业与减贫增收之间关系的文献虽然已经较为丰富,但尚未达成共识(Sutter等,2019)。有学者认为创业不仅能提高创业者收入(Blattman等,2018),还能为低收入

人群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Naminse 等,2019);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创业的增收效应并不明显(Kautonen 等,2017)。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返乡创业潮”出现伊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增收效应就备受学者们的关注(王郁昭,1994),但已有文献更多地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严谨的计量分析并不丰富。在理论分析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帮助创业者自身脱贫致富、带动更多农民增收。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方面通过新产业、新业态创造就近就业机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陈锡文,2018);另一方面通过发挥示范作用,吸引更多农民通过创业增收(厉以宁,200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前后最大的变化是家庭福祉显著提升,而不一定是收入绝对量的增加(李周,2019)。在实证分析方面,王轶和刘蕾(2022)采用调查数据证实农民工高质量返乡创业有助于提高返乡创业企业雇员工资性收入;何宜庆等(2022)采用县域数据验证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不过,上述研究或是无法全面刻画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的结构影响,或是未能从微观层面考察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除提升收入水平以外,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明显,且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马建堂,2022)。面向共同富裕目标,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会扩大还是会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以往研究讨论了农民创业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但鲜有研究立足返乡创业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并且,已有探讨农民创业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文献也没有形成一致结论。一方面,有研究认为,无论创业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导致创业者集中于整个收入分配的两端(Åstebro 等,2011),因此农民创业会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沈栩航等,2020;单德朋、张永奇,2021)。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农户创业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拓宽农户增收渠道(Kimhi,2010),进而对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发挥积极作用(王轶、刘蕾,2022)。返乡农民工创业与本土农民创业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内在区别。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动机并非迫于生计,更多的是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杨婵等,2017),因而可能具有更好的益贫性。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尽管学界围绕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收入及农户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已经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本文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外生冲击,进一步分析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本文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2010~2021 年 200 363 个农户观测样本的面板数据,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来考察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通过大样本和双重差分法尽量减少标准误和估计偏误,提高参数估计的效率和一致性,增强结果可信度;其次,本文从收

人来源的视角,探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结构影响,细致刻画出试点政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影响,从而揭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进农户增收的微观机制;最后,本文分别从国家和区域层面检验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探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不同群体特征农户的差异化影响,厘清该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改善全国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至关重要。

##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 (一) 政策背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中国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加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机器对人工的替代,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呈现减少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面临严峻局面(黄祖辉、胡伟斌,2019)。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可以促就业、增收入,又能够激发输出地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区域均衡发展,于是,相关部门开始积极探索完善返乡创业体制机制。开展支持农民工等外出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是完善返乡创业体制机制的重要方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文简称“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于 2016 年 2 月、12 月和 2017 年 10 月分别批复设立了 90、116 和 135 个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试点示范由各县自主申报、各省研究确定试点推荐名单,最后由国家发改委确定并公布试点名单。试点示范的选择范围上,一是以外出人员较多的输出地县级城市为主;二是需满足试点地区高度重视、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以及具有明确的试点方向和工作重点。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具体支持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在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方面,一是加快试点地区交通、通信和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通过整合发展返乡创业园区,聚集生产要素,三是简化审批手续,提升服务能力。在降低创业成本方面,一是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完善鼓励创业的用地支持、税费、租金减免和资金补贴等扶持政策,适当放宽用电用水标准,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新贷款担保方式,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公司债券,依托股权众筹投资试点,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提升返乡人员创业就业能力方面,一是开发符合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需要的培训课程,实施“公益创业培训课程免费下县乡”活动,二是通过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返乡创业产业集群,引导返乡人员围绕龙头产业、龙头企业集群创业。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通过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降低创业成本和提高创业者能力,帮助农民工等外出人员在本地或周边地区开展农产品加工、电商物流、服务业等多种形式的创业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实现自我就业,还可以带动其他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2~2022 年中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 1 220 万人,带动超

过 5 000 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约 80%返乡创业人员为农民工<sup>①</sup>。

## (二) 理论分析

### 1. 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工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业,农民进城务工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Lewis, 1954)。但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生产生活面临就业阻碍和无法照顾老人、子女等诸多困难(张琛等, 2023)。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经济水平和生活环境已经有了巨大改善,加之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不断推进,农村地区正迎来发展的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返乡就业和生活成为外出劳动力谋求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为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助于当地农户拓宽增收渠道,其具体机制如下。

第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农户参与本地创业活动,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首先,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开展创业活动(Audretsch 等, 2015),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加快了试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实施创业活动、创业绩效的关键因素(Chung 等, 2000; Hmieleski 等, 2016; 何婧、李庆海, 2019)。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通过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降低创业成本和提高创业者能力,实现创业者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同步提升,进而促进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其次,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也有助于激发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力。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示范效应,创业榜样能够为农村地区其他群体提供精神上的激励和行为上的指导,有助于带动周边农户创业(李静等, 2017)。创业是减贫增收的重要手段(Sutter 等, 2019),因此,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可能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增加农户收入。

第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农村地区创业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户工资性收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业劳动力仍有 3.1 亿人<sup>②</sup>,仍需大量减少(向晶、钟甫宁, 2018; 黄季焜, 2022)。然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面临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高鸣, 2023),农村地区创业活动的繁荣则可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首先,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机并非迫于生计,更多的是为追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等社会性动机(杨婵等, 2017),而带动周边农户致富是部分返乡创业者赋予自己的使命,这会促使返乡创业者为周边农户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其次,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不仅

① 资料来源:光明网,《截至 2022 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 1 220 万人》:<https://m.gmw.cn/baijia/2023-02/17/36372410.html>。

② 数据来源:《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 [http://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_1902105.html](http://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_1902105.html)。



包括传统种养殖业的升级,还包括工业制品、休闲娱乐等二、三产业(张鑫等,2015),会产生新增用工需求。最后,农户参与创业不仅可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还有可能带动上下游产业提供间接就业,有利于实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秦芳等,2022)。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增加农户收入。

2. 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收入,是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表现(李实、朱梦冰,2022)。农村低收入群体具有以下 3 个特征:一是中西部低收入人群总体收入水平低于东部地区,二是中西部低收入群体占比高于东部地区,三是低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罗楚亮、梁晓慧,2022)。农村低收入群体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地区就业机会不足(黄征学等,2021);低受教育程度群体收入较低,则主要是由于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抑制了其流入经济发达地区参与就业,而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增收渠道较窄(赵西亮,2017)。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有助于中西部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和农村低受教育程度群体增收。首先,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旨在通过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劳动力流出地经济发展,该政策的实施效果显然会受到流出地农民工数量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流出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因此,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外出农民工较多的中西部地区(黄祖辉等,2022)。其次,农民工返乡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大量的本地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农民工返乡后所创办的企业大多涉及小型加工业、乡村旅游业等,往往不要求雇员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返乡创业企业可以吸纳受人力资本水平限制而未能流入经济发达地区就业的低受教育程度群体参与本地非农就业,进而提升该群体收入水平。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在不同时间、不同试点县对农户收入造成的外生冲击,为本文研究创造了一个近似自然实验的良好条件。因此,本文将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识别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的因果效应。在本文所构建的模型中,处于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农户属于实验组,处于非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农户属于对照组。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ln Y_{it} = \alpha_0 + \beta_0 DID_{it} + \gamma X'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tag{1}$$

其中, $\ln Y_{it}$  表示农户  $i$  第  $t$  年的家庭总收入对数值; $DID_{it}$  表示农户  $i$  所在县级单位在第  $t$  年是否被列入返乡创业试点地区,是取值为 1,否取值为 0;回归系数  $\beta_0$  反映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若  $\beta_0$  显著为正,则表明返乡创

业试点政策对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本文还纳入了影响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各种控制变量  $X'_{it}$ , 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农户特征变量和村庄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干扰, 本文同时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年份层面的时间固定效应  $\mu_t$  和农户层面的固定效应  $\nu_i$ ;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 (二) 变量定义

### 1.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收入

本文借鉴周力和沈坤荣(2022)的做法, 采用农户家庭总收入对数值衡量农户收入。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统计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包括家庭经营收入, 乡村干部、乡村教师工资收入, 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 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 租赁收入, 利息、股息、红利收入, 离退休金、养老金、高龄津贴, 以及其他非借贷性收入 8 类来源。在分析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中, 本文将农户家庭总收入划分为经营性收入、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3 类。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本文使用以 2010 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所有收入相关的变量进行了平减处理。

### 2. 核心解释变量: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DID_{it}$  ), 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的年份, 取值为 1, 反之取值为 0; 控制组  $DID_{it}$  全部取值为 0。

### 3. 其他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借鉴既有文献的做法(周力、沈坤荣, 2022; 朱秋博等, 2022), 设置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着重控制户主特征变量、农户特征变量和村庄特征变量。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健康程度、文化程度和接受农业教育或培训情况, 这些变量可以反映户主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生产能力。农户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规模、资产状况和经营规模, 这些变量可以反映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和经营规模。村庄特征变量包括村庄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交通水平和产业水平, 这些变量可以反映农户所处的区域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考虑到当期的村庄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即村庄特征可能受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影响, 本文对其作滞后一期处理后纳入模型。

本文以 2010 年为例描述样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农户家庭总收入对数值的平均值为 10.3, 与张勋等(2019)的样本特征基本一致。从个体特征看, 样本农户户主男性占比 93.4%, 平均年龄为 53.7 岁, 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等现实情况相符。从家庭特征看, 样本农户平均劳动力数量为 3.6 人; 从村庄特征看, 滞后 1 期全村总人口数的对数值为 7.4, 与周广肃(2017)的特征基本相同。由此可知, 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数据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来自国家发改委网站。实证分析中使用的农户

表 1 以 2010 年为例的描述性统计(N=17113)

变 量	变量说明	均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收入	农户家庭总收入(元)的对数	10.318(0.706)	8.322	12.823
户主性别	户主为男性时取值为 1,女性取值为 0	0.934	0	1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53.680(10.530)	30	82
户主丧失劳动能力	虚拟变量	0.018	0	0
户主健康程度差	虚拟变量	0.046	0	1
户主健康程度中	虚拟变量	0.116	0	1
户主健康程度良	虚拟变量	0.313	0	1
户主健康程度优	虚拟变量	0.506	0	1
户主受教育水平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6.795(2.560)	0	12
户主接受农业教育或培训	接受过农业教育或培训取值为 1,否则为 0	0.051	0	1
农户劳动力数量	劳动力人数的对数值	1.235(0.347)	0.000	1.946
农户资产状况	年末拥有固定生产性资产(元)的对数	6.457(3.545)	0.000	12.139
农户经营规模	农户家庭耕地经营面积(亩)的对数	1.525(1.031)	0.000	4.511
村庄人口规模	滞后 1 期全村总人口数的对数值	7.435(0.654)	5.635	8.921
村庄经济水平	滞后 1 期全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的对数	8.475(0.452)	7.090	10.068
村庄交通水平	滞后 1 期村庄离公路干线距离(公里)的对数	2.990(3.013)	0.000	31.000
村庄产业水平	滞后 1 期的村庄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比	0.490(0.267)	0.001	0.999

注:表中汇报的是 2010 年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农户生产性资产原值涵盖了役畜、大中型铁木农具、农林牧渔机械、工业机械、运输机械、生产用房、设施农业固定资产等。

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每年从各省抽取相同数量的不同收入水平的县,在县内部以相同的规则选取样本村,并从村内部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农户进行跟踪调查。目前该数据库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的 400 余个样本村、2.3 万个记账农(牧)户。调查内容涵盖农户的家庭成员信息、生产经营情况、所处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在对农户家庭成员的调查中,记录了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年龄、学历和就业等信息;在对农户生产经营情况的调查中,记载了农户的劳力分配、生产投资、收入支出等情况;在对农户所处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调查中,村庄地理位置、人均收入、各产业发展情况等也均有详细记录,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数据。

为了分析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样本时期为 2010~2021 年。之所以选取这一样本时期,主要是考虑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贺雪峰等,2010),进而可能影响农户的收入情况;从 2010 年开始选择样本时期能够减弱这一外生事件的影响。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文章对农户收入等变量做了前后 1%水平的截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可以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得到的数据共包含 395 个村庄层面样本,200 363 个农户层面观测值,本文以此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一步地,本文将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与固定观察点县级单

位进行匹配,在研究样本中识别出位于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村层面样本 54 个,分别位于 53 个不同的县级单位。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表 2 模型 1 报告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系数为 0.031,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增加农户收入。相比未实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地区的农户,实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地区农户的收入增长 3.1%,由此验证了研究假设 1。

模型 2 至模型 4 报告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 2 的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使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 7.6%( $=e^{0.073}-1$ );模型 3 的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使农户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增长 24.9%( $=e^{0.222}-1$ );模型 4 的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与农户其他收入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和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进而提升农

表 2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N=200363)

变 量	农户收入	经营性收入	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	其他收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0.031*** (0.009)	0.073** (0.036)	0.222*** (0.067)	0.008 (0.046)
户主性别	0.125*** (0.014)	0.309*** (0.057)	0.235*** (0.081)	0.125* (0.067)
户主年龄	-0.006*** (0.001)	-0.001 (0.002)	-0.012*** (0.003)	0.005** (0.002)
户主健康程度差(对照:丧失劳动能力)	-0.012 (0.016)	0.276*** (0.065)	0.002 (0.089)	0.055 (0.071)
户主健康程度中(对照:丧失劳动能力)	0.014 (0.016)	0.313*** (0.066)	0.173* (0.090)	0.002 (0.072)
户主健康程度良(对照:丧失劳动能力)	0.044*** (0.016)	0.392*** (0.066)	0.278*** (0.090)	0.026 (0.071)
户主健康程度优(对照:丧失劳动能力)	0.077*** (0.016)	0.372*** (0.066)	0.392*** (0.092)	0.023 (0.073)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06*** (0.002)	-0.000 (0.007)	0.011 (0.010)	0.011 (0.008)
户主接受农业教育或培训	0.052*** (0.010)	0.170*** (0.041)	-0.133* (0.073)	0.038 (0.056)
农户劳动力数量	0.385*** (0.007)	0.365*** (0.025)	0.493*** (0.037)	0.897*** (0.032)
农户资产状况	0.009*** (0.001)	0.046*** (0.004)	-0.037*** (0.006)	-0.002 (0.004)
农户经营规模	0.038*** (0.004)	0.798*** (0.024)	0.371*** (0.027)	-0.246*** (0.018)
村庄人口规模	0.070*** (0.009)	0.195*** (0.043)	-0.169** (0.071)	0.039 (0.048)
村庄经济水平	0.045*** (0.004)	0.018 (0.017)	-0.043 (0.028)	-0.026 (0.024)
村庄交通水平	-0.004*** (0.001)	-0.011*** (0.003)	-0.020*** (0.005)	0.008* (0.004)
村庄产业水平	-0.015** (0.007)	-0.021 (0.034)	0.009 (0.051)	-0.062 (0.042)
R <sup>2</sup>	0.751	0.834	0.740	0.492

注:模型还控制了农户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如无其他说明,下表同。



户的总**体**收入水平。同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最大,说明通过促进农村地区创业活动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是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进农户增收的重要路径。

在控制变量方面,户主、农户和村庄的基本特征均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户主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户收入水平越高,与现实情况吻合;农户、村庄的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越好,则农户收入水平越高,与朱秋博等(2022)的研究发现一致。

(二)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为确保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估计的平行趋势假设成立,本文设定如下方程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是否平行:

$$\ln Y_{it} = \alpha_2 + \beta_k \sum_{k=-3, k \neq -1}^{k=4} DID_{ik} + \gamma X'_{it} + \mu_t + v_i + \varepsilon_{it} \tag{2}$$

其中  $DID_{ik}$  为政策实施窗口,政策实施第  $k$  年取值为 1,其他年份取值为 0;当  $k$  取值为 0 时表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当年,当  $k$  取负数时表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前  $|k|$  年,当  $k$  取正数时表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后  $k$  年。本文将政策实施前 1 期( $k=-1$ )作为基准组,检验样本农户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前 3 年到后 4 年的动态变化趋势。对于其他年份的观测值,本文采取两端收尾的方法进行处理,即  $k=4$  表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 4 年及以上的所有年份, $k=-3$  表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前 3 年及以上的所有年份。

图 1 报告了 90%置信区间下  $\beta_k$  的具体估计结果。由图 1 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之前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农户的收入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之前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因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估计的基准结果是稳健的。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即从样本中随机生成处理组样本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将核心解释变量政策实施时点随机赋给每一个样本,从而随机生成安慰剂检验的伪处理组。理论上,由于此时处理组是虚构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其估计系数应在 0 附近。为确保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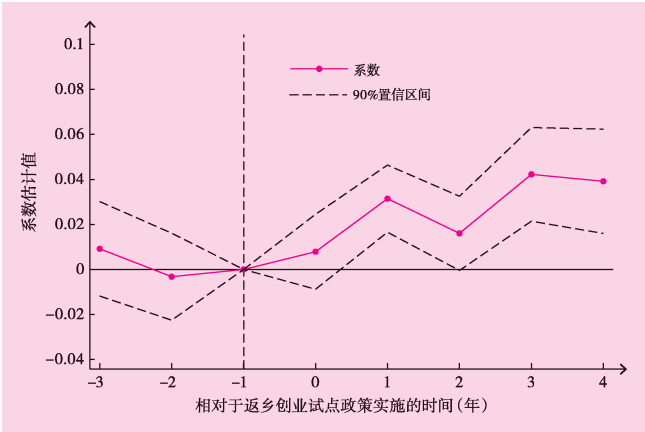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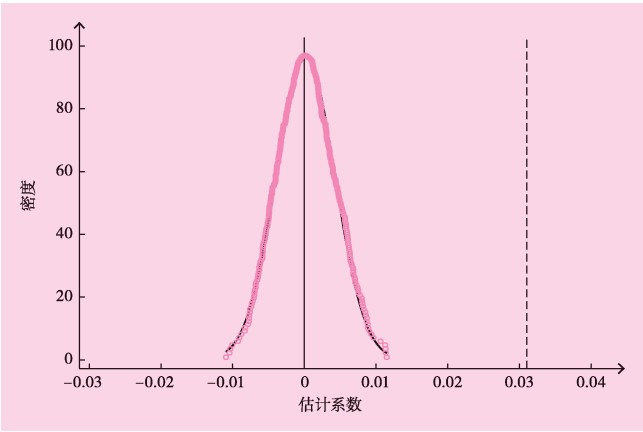


图 2 置换检验结果

注：图中垂直虚线代表基准模型的估计系数。

结果可靠,本文重复 500 次上述回归过程,并根据估计结果绘制系数分布图。由图 2 可知,置换检验中伪回归系数集中分布于 0 附近,远小于基准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值,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三) 稳健性检验

1. 剔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在实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与农村地区创业活动相关的政策也在实施,这可能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混杂效应,因此需要控制这些政策的影响,以确保估计结果反映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本身的影响。借鉴评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效果的既有研究(黄祖辉等,2022),样本期内可能影响本文估计结果准确性的政策有二:一是 2014 年实施的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政策,二是 2014 和 2015 年实施的信息进村入户工程试点政策。这两项政策可能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存在时间上的混淆,从而影响针对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农户增收效应的估计。因此,本文设置这两项政策的虚拟变量,各地区在入选当年及之后的年份里,对应政策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这样可以有效地消除其他政策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并且保持了模型的简洁性和可操作性。表 3 模型 5 的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系数估计值变化不大,意味着同期其他与农村地区创业活动相关的重要政策的实施并未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

2. 更换被解释变量、研究样本

在评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时,可能存在多种衡量农户收入水平的指标,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为了考察不同衡量方式对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农户人均收入衡量农户收入,重新回归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3 模型 6 的估计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即便考虑农户家庭规模的变化,仍然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户收入,本研究的基本发现具有稳健性。

2020 年以来,受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返乡入乡创业者规模加速增长(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智库课题组,2022),这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产生影响的时间存在重合,因此可能影响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文将 2020~2021 年的样本剔除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模型 7 所示。可以看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依然显著为正,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此外,在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时,样本不平衡可能导致估计效率降低或估计偏误增大。为了排除这种情况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样本处理为平衡面板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8 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剔除可能由人口迁移和死亡导致的不完整的数据样本后,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系数为 0.094,高于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结果。这说明,本文基准回归所展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可能是较为保守的,实际上该政策具有更大的增收效应。

### 3.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

本文中在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因果推断时,样本会因农户受到政策干预的时点不同而分为多个组别,其固定效应估计量是将受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干预的组与其他不同组别进行比较得出的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值。然而,在与其他不同组别进行比较的时候,如果选择先受到政策干预的组作为对照组,该对照组事前趋势已经因政策实施而发生变化,可能由此产生估计结果偏误。为此,本文参考 Goodman-Bacon(2021)的研究,将样本数据处理为 2010~2021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并对基准回归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合适的处理效应的权重为 99.4%,不合适的处理效应仅占总效应的 0.6%,对加权平均处理效应的干扰非常小。

进一步地,本文根据 Callaway 等(2021)的思路计算两阶段 Bootstrap 估计量,这种方法一方面可以允许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并且能够考虑不同年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处理组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识别出一系列因果效应参数,并能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总体效应评估。表 3 模型 9 的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依然显著为正,说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增收。

表 3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剔除其他 政策影响 模型 5	更换被解释 变量 模型 6	剔除 2020~2021 年 样本 模型 7	更换研究 样本 模型 8	更换双重差分 估计方法 模型 9	PSM-DID 模型 10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0.030*** (0.009)	0.019** (0.009)	0.016* (0.009)	0.094*** (0.020)	0.066*** (0.022)	0.029*** (0.009)
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 城市试点政策	0.008 (0.011)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政策	0.044*** (0.013)					
R <sup>2</sup>	0.748	0.689	0.759	0.723	—	0.758
观测值	194546	200363	174009	45168	45168	167141

注:模型设定与基准设定基本一致。受限于篇幅,未完整展示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如无其他说明,下表同。

4.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本文基准回归中处理组样本相对偏少,因此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本文关注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是以县(市、区)为单位进行申请的,因此选取县级单位层面的经济状况、政府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化程度 5 个影响城市是否能够入选试点的选择变量进行匹配。具体而言,借鉴已有文献普遍做法,采用人均 GDP 衡量经济状况,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名义 GDP 比值来刻画政府规模,以地区年末总人口数衡量人口规模,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名义 GDP 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个数衡量产业规模化程度。本文采用 1:2 最近邻匹配方法执行逐年匹配,并基于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分析,从而克服自选择偏差,使因果估计更为准确。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大幅度缩小,且均小于 5%,说明本文选取的协变量是有效的。进一步地,对匹配后的样本利用 DID 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表 3 模型 10 的结果表明,即便考虑各县的基本特征差异之后,本文的基准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五、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

本文采用三种方法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第一,分别估计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不同收入组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通过比较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不同收入组农户的边际贡献差异,判断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按照农户人均收入将样本分为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分组进行回归。表 4 模型 11 和模型 12 的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进了低收入组农户增收,对高收入组农户的增收效应不显著,说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有助于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表 4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变 量	农户收入		农户基尼	农户泰尔	村庄基尼	村庄泰尔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系数	指数	系数	指数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0.008(0.011)	0.021 <sup>**</sup> (0.010)	-0.001 <sup>***</sup> (0.000)	-0.001 <sup>**</sup> (0.000)	-0.009 <sup>*</sup> (0.005)	-0.013 <sup>**</sup> (0.006)
R <sup>2</sup>	0.748	0.797	0.612	0.608	0.775	0.774
观测值	97459	97783	200363	200363	3075	3075

注:模型 11 至模型 14 为农户样本回归,自变量和固定效应与基准回归一致。模型 15 和模型 16 为村庄样本回归,控制变量为村庄特征变量,同时控制了村庄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第二,上述方法在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分组标准是否合理、分组内部的异质性是否得到有效处理等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再



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Firpo 等,2016;Rios-Avila,2020)。相比传统的 OLS 回归,RIF 回归能够反映自变量分布的边际变化对收入差距指标的边际影响,估计结果更加稳健。本文选择农户基尼系数、农户泰尔指数对农户收入差距进行衡量,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都是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程度度的指标,这两个指标的数值越接近 1 表示越不平等。基于 RIF 回归方法的模型 13 和模型 14 估计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缩小了农户内部整体的收入差距。

第三,为了从区域层面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村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 15 和模型 16 的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缩小了村庄内部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上一系列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 2。

(二) 基于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更有助于两类群体增收:一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二是低人力资本水平群体。对于前者,既有文献已经进行了充分论证(黄祖辉等,2022;何宜庆等,2022),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不同人力资本农户收入的差异化效应,揭示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本文根据户主受教育程度将样本划分为“低受教育程度”组和“高受教育程度”组,然后分别进行回归。考虑到农村地区户主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参考张勋等(2019)的研究,本文将户主受教育年限为 0~6 年定义成“低受教育程度”组,将户主受教育年限为 6 年以上定义成“高受教育程度”组。表 5 模型 17 和模型 18 的回归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低受教育程度”组农户的收入,而对“高受教育程度”组农户的增收效应不显著;模型 19 至模型 22 的回归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促进了“低受教育程度”组农户经营性收入和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但对“高受教育程度”组农户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系列结果证实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低收入农户表现出一定的包容性特征。

表 5 人力资本异质性

变 量	农户收入		经营性收入		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	
	低受教育程度	高受教育程度	低受教育程度	高受教育程度	低受教育程度	高受教育程度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0.033 <sup>**</sup> (0.015)	0.018(0.012)	0.251 <sup>***</sup> (0.053)	-0.019(0.047)	0.412 <sup>***</sup> (0.106)	0.107(0.088)
R <sup>2</sup>	0.787	0.732	0.851	0.843	0.765	0.746
观测值	85673	112386	85673	112386	85673	112386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2010~2021 年 200 363 个农户观测样本组成的面板

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府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能促进农户增收,这一结论在进行剔除其他政策影响、更换被解释变量和研究样本、考虑多期 DID 模型存在的异质性处理效应、考虑自选择偏误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农户的收入结构看,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主要促进了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和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增加,并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仅如此,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表现为缩小农村内部整体的收入差距和村庄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具有益贫性,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水平农户、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户增收而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两方面的政策启示。首先,应扩大试点政策覆盖区域,推广返乡创业试点经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不仅能够在总体上促进农户增收,还能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要扩大试点政策覆盖区域,并将试点地区典型经验予以推广,使试点成果惠及更多的地区和农民。其次,继续大力支持返乡创业,激发农村地区创业活力。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能提高创业农户的收入,也能对非创业农户产生溢出效应,这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应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优化服务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农村地区创业活力;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创业培训等缓解返乡农民工的资金约束、提升其创业能力,促进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 参考文献:

1. 陈锡文(2018):《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2. 高鸣(2023):《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困境与政策构想》,《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3. 何婧、李庆海(2019):《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4. 贺雪峰等(2010):《农民工返乡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5. 何宜庆等(2022):《政府推动型返乡创业能否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基于双重差分的经验评估》,《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6. 黄季焜(2022):《加快农村经济转型,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农业经济问题》,第7期。
7. 黄征学等(2021):《建立低收入群体长效增收机制的着力点、路径与建议》,《经济纵横》,第2期。
8. 黄祖辉等(2022):《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9. 黄祖辉、胡伟斌(2019):《中国农民工的演变轨迹与发展前瞻》,《学术月刊》,第3期。
10. 李静等(2017):《榜样会触发个体创业吗?——基于农民样本的创业事件研究》,《管理评论》,第3期。

11. 李实、朱梦冰(2022):《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第1期。
12. 厉以宁(2009):《走向城乡一体化:建国60年城乡体制的变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13. 李周(2019):《农民流动:70年历史变迁与未来30年展望》,《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14. 罗楚亮、梁晓慧(2022):《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与共同富裕》,《金融经济学研究》,第1期。
15. 马建堂(2022):《奋力迈上共同富裕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
16. 秦芳等(2022):《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农户增收?——来自农村电商发展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2期。
17. 单德朋、张永奇(2021):《创业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华东经济管理》,第3期。
18. 沈栩航等(2020):《创业会加剧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吗》,《农业技术经济》,第10期。
19. 王轶、刘蕾(2022):《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
20. 王郁昭(1994):《关于农民跨区域流动问题》,《管理世界》,第6期。
21. 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智库课题组(2022):《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入乡“创业潮”探究——基于湖北省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2. 习近平(2023):《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第6期。
23. 向晶、钟甫宁(2018):《农村人口转移、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经济问题》,第12期。
24. 杨婵等(2017):《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25. 赵西亮(2017):《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经济研究》,第12期。
26. 张琛等(2023):《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会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吗》,《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27. 张敏等(2022):《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的就业政策效应:二元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视角》,《经济研究》,第7期。
28. 张鑫等(2015):《社会资本、借贷特征与农民创业模式选择》,《财经问题研究》,第3期。
29. 张勋等(2019):《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第8期。
30. 周广肃等(2017):《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经济学(季刊)》,第2期。
31. 周力、沈坤荣(2022):《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农户增收效应——来自“三权分置”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5期。
32. 朱秋博等(2022):《信息化能促进农户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吗?》,《经济学(季刊)》,第1期。
33. Åstebro T., Chen J., Thompson P. (2011), Stars and Misfits: Self-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s. *Management Science*. 57(11):1999–2017.
34. Audretsch D.B., Heger D., Veith T. (2015), Infrastruc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4:219–230.
35. Blattman C., Dercon S. (2018),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and Entrepreneurial Work on Income and Health: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Ethiop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0(3):1–38.
36. Callaway B., Sant'Anna P.H.C. (2021),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25(2):200–230.
37. Chung S., Singh H., Lee K. (2000), Complementarity, Status Similarity and Social Capital as Drivers of Alliance Form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1):1–22.
38. Firpo S., Pinto C. (2016),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Interventions Using Changes in Inequality Measur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31(3):457–486.

39. Goodman-Bacon A.(2021),Difference-In-Difference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25(2):254-277.

40. Hmieleski K.M.,Lerner D.A.(2016),The Dark Triad and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An Examination of Un-productive Versus Productive Entrepreneurial Motive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4:7-32.

41. Kautonen T.,Kibler E.,Minniti M.(2017),Late-career Entrepreneurship,Income and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2(3):318-333.

42. Kimhi A.(2010),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Southern Ethiopi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4:81-91.

43. Lewis W.A.(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2):139-191.

44. Naminse E.Y.,Zhuang J.,Zhu F.(2019),The Rel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Poverty Sllevation in China. *Management Decision*. 57(9):2593-2611.

45. Rios-Avila F.(2020),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s (RIFs) in Stata:RIF Regression and RIF Decomposition. *The Stata Journal*. 20(1):51-94.

46. Sutter C.,Bruton G.D.,Chen J.(2019),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Extreme Poverty: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4(1):197-214.

### The Impact of the Pilot Policy of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Zheng Zhaofeng   Song Hongyuan

**Abstract:** Promoti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prioritizing employment,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We use data from China's National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Survey from 2010 to 2021,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pilot policies encouraging rural 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in hometown on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and income disparity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ology with staggered treat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lo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overall household income by boosting operational income and local wages. These programs narrow the inter-household income gaps in a village as well as the rural income differences as a whole. The programs also have a poverty-alleviating effect primarily by promoting income growth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those with low human capital, thereby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policy implications on expanding the pilot program coverage, sharing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supporting more return 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so as to stimulate rural economic vitality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Increase; Income Gap;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许 多)